

美学现代化问题论集

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情报服务部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

B83-53

<15>

说 明

839193

一、本书所收论文是经过系统检索后精选的，力求反映应用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模糊数学……等现代科学方法研究美学的最新成果，可供高校师生、研究人员、美学爱好者参考。

二、本书原定采用誊影或胶印办法印刷，因效果欠佳，改为打印。

福建师大图书馆情报服务部社科组

1985. 10



22162349

徐州师院图书馆

目 录

- 一、美学和系统方法刍议……………凌继尧（1）
- 二、运用系统原理进行审美研究试探……………曾永成（13）
- 三、美与信息的关系……………黄振亮（24）
- 四、论美的社会本质……………陈明兆 邓也穆（35）
- 五、从信息流程看艺术创作本质的层次……………陶 同（49）
- 六、从马克思主义和现代控制论观点看审美现
象……………黄海澄（67）
- 七、美是人的抗异化——负反馈优化信息（人
化信息）……………陶 同（97）
- 八、美学研究与模糊数学……………高从宜（109）
- 九、论模糊数学给美学的启发——美学的新探
索之一……………王世德（124）
- 十、论审美趣味自组织的协同性……………丁 宁（142）
- 十一、从热学方法论看审美结构……………陶代汉（162）
- 十二、美学研究方法的过去与未来……………曹俊峰（171）
- 十三、美学研究的方法应当多元化……………朱立元（186）

美学和系统方法刍议

凌 继 尧

列宁曾在 1914 年就预见到，在二十世纪将会出现从自然科学奔向社会科学的更加强大的潮流（参见《列宁全集》第 20 卷第 189 页）。在现代科学的发展中，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相互渗透日益明显。自然科学的一些概念和方法逐渐为社会科学所利用。在各种知识领域中得到推广应用的系统方法，就反映了现代科学的这种整体化趋势。用系统方法去观察和分析被研究的客体，能够更充分、深刻、全面地揭示客体各部分之间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本质。由于审美现象和艺术活动是复杂地组织起来的系统，因此，在美学和文化研究中运用系统方法具有诱人的前景。不过，这对于我们来说完全是一个崭新的课题，本文仅就某些方面作初步的、有限的尝试。

所谓系统，就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要素组成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整体，这个整体具有组成它的各个要素所没有的新的性质。恩格斯曾把辩证法定义为“关于普遍联系的科学”。系统方法集中体现了普遍联系的原则。它作为一种方法论，受到人们越来越大的重视。目前，国外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和工程技术中，正在形成一股研究系统理论的热潮。迄今为止，世界上已有成百个

系统问题的科研机构，有数十种专门杂志。有关系统研究的著作也大量涌现。苏联从1958年到1976年就出版了千余种这方面的著作。

系统方法的基本原则是什么？对此，国内外理论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例如，有些人认为“组织”和“结构”是系统的本质特征，认识某个作为系统的客体应该包括下列基本因素：1、确定系统的结构和（或）组织；2、结构的知识能够确定系统内在的整体属性；3、确定系统的功能；4、确定系统的形成过程。^[1] [1] 这派理论家把系统的功能和形成过程当作结构分析的简单结果，把系统研究等同于结构分析，因此普遍使用“系统结构分析”的术语（见A·B·尼基京《系统结构分析的方法论问题讨论》，载《哲学科学》1971年第5期；秋赫京也认为使用“系统结构方法”的概念是合理的，见《反映、系统、控制论》一书第15页）。另一些人认为，功能分析是系统研究的最重要的原则，他们提出“功能系统理论”。^[2] [2] 还有些人认为，每种活动的系统具有三种基本参数——结构、功能和历史^[3] [3]。他们也把这种观点运用到社会系统的研究上去^[4] [4]。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我们所面对着的整个自然界形成一个体系（即系统——笔者注），即各种物体相互联系的总体。”（第54页）根据恩格斯的教导，我们认为整体性（总体）和相互联系是系统方法最重要的基本原则。以往人们认识事物的主要方式是从局部到整体、从客体到环境，而整体原则要求从系统整体出发来认识局部，认识整体是认识局部的前提。这样，观察问题的角度发生了变化。认识一个事物时，不能撇开它所归属的系统，而正是把它当作整体中的一个局部，看到整体总特征对它的影响。

相互联系的原则与整体性原则是一致的。整体大于各孤立部分的总和，这是系统方法的著名定律。由于组成系统整体的各个要素不是简单地相加和毗邻，而是处在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中，所以整体具有它的组成部分处于孤立状态时所没有的新的性质。

在美学和文艺研究中运用系统方法，必须处理好它和传统的文艺学方法之间的关系。科学方法论体系可以分为三个层次：（一）哲学方法：研究适用于一切科学的普遍的方法原理。（二）一般科学方法：研究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共同适用或分别适用的一些方法，它具有跨学科的性质。（三）专门科学方法：研究各门学科特殊的具体方法。系统方法属于方法论体系的第二种层次，传统的文艺学方法则属于第三种层次。一方面，文艺研究的系统方法不能代替文艺研究的辩证唯物主义方法的基本原则，也就是说，它不能取得哲学方法论的地位。另一方面，在文艺研究中运用系统方法时不能简单地套用它的定义和术语，而必须从文艺的本质特征出发，使这种方法具体化。因为方法是对象的类似物，受到所研究客体的特征的制约。

传统的文艺学方法是在研究文艺本身的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们适应于文艺的本质，是文艺学的一个领域，存在于文艺学内部。而系统方法形成于文艺学外部，它们是在其它一些科学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而文艺从来不是这些科学所研究的特殊对象。系统方法从外部、从其他科学知识领域被引进到文艺学中来，它们不是特殊的文艺学方法。为了在文艺研究中有效地运用系统方法，必须使它们发生新的美学变化。

如果把某一时代、某一国家的文艺看作为一个完整的系统，即由各种文艺样式——文学、音乐、绘画、舞蹈、戏剧、雕塑、建筑等构成的统一整体，而不是它们的简单堆积，那么，对人类艺术活动的研究，无论历史的研究还是理论的研究，可以有三种不同的途径。

第一种途径研究特殊性，即研究每种文艺样式的特征。如果说的是文学，那么，这种途径就要研究文学的功用、结构和发展的特殊的、不同于其他文艺样式（音乐、绘画、舞蹈、戏剧等）的规律。第二种途径研究普遍性，即研究各种文艺样式共同的规律。这些规律使文艺创作同其他所有人类活动（科学活动、道德活动、宗教活动等）区别开来，它们说明文艺创作本身的特点，但同文艺创作的具体表现形式无关。第三种途径研究相关性，即研究某一种文艺样式同其他文艺样式的相互联系。既然各种文艺样式处在一个共同的系统中，那么，该系统中的每个要素都同其他要素发生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研究这种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对于理解每个要素和由这些要素所组成的系统就十分必要。

在我国的美学和文艺研究中，第三种途径是最为薄弱的一环，在方法论上尚未流行开来。当然，由于每种文艺样式的相对独立性，也可以不考虑，或者较少地考虑其他文艺样式对它的影响，而去单独地研究它。例如，有的造诣很高的文学史家并不懂得音乐史和绘画史，有的音乐理论家也不熟悉绘画和雕塑。不过，为了探索某个时代、社会的文艺整体审美特征，把握文艺潮流发展的深刻的社会

原因和思想的内在逻辑，从而更好地理解、欣赏文艺，必须研究文艺整体中所有成分的相互联系，在每种单独的文艺样式同其他文艺样式的结合统一中对之进行研究。

国外学者把研究文艺相关性的这种方法称作为文化学方法。文化学实际上是研究文化的结构、功用和发展的规律的一门科学。换言之，文化学是文化的一般理论，或者也可以说是文化哲学。这是一门新兴的科学，它在西方的历史稍微长一些，在苏联尚处于开始阶段。关于文化，国外学者提出过上百种不同的定义。我们认为，把文化理解为“人类活动的方式和产品的总和”是可取的。也就是说，文化是与“人”和“社会”同等规模的概念，它处在“自然——社会——人——文化”这些哲学概念的系统中，表明人使自然转变成人手创造的“第二自然”的方式和结果。马克思在1857—1859年经济学手稿中，划分出人掌握世界的三种不同的方式：物质——实践方式、实践——精神方式和精神——理论方式。物质生产属于第一种方式，科学理论属于第三种方式，文艺则是第二种方式的基本代表，因为文艺实现着对现实的改造，但不是物质的改造，而是在想象中实现的改造，也就是实践——精神的改造。相应地，文化可以分成三种基本的层次——物质层次、精神层次和文艺层次。因此，文艺研究的文化学方法应该研究文艺层次中各种文艺样式的相互联系，以及它们同把它们联结在一起的整体的相互联系；研究文艺在包容它的更大的系统——整个文化环境中产生和发展的规律。可见，文化学方法是系统方法的一种具体表现。

试以李泽厚同志的《美的历程》一书（1981年，文物出版社）来说，这本书在学术界获得较好的反响。它最大的优点是在方法论上给人以启示。作者虽然没有特意标明，但他实际上是把文化

学方法作为他的一种方法论工具的。例如，他用“盛唐之音”作为该书第七章的标题，他解释道，这是因为音乐性的表现力量渗透了盛唐各艺术部类，成为它们的美的灵魂。按照我们的理解，所谓“盛唐之音”，就是作为某种社会心理的和审美的完整体出现在我们面前的盛唐文艺的风格。盛唐之音在诗歌上的顶峰是李白。他的诗歌竭尽“笑傲王侯，蔑视世俗，不满现实，指斥人生”之能事，“痛快淋漓，天才极致，似乎没有任何约束，似乎毫无规范可循”。与“诗仙”李白齐名的是“草圣”张旭。以张旭、怀素为代表的草书，特别是狂草，其笔墨线条如走龙蛇，刚圆遒劲，结体布局奇险万状，忽轻忽重，情态气势变化无常、一派飞动。与诗歌、书法相互影响而又平行发展的是音乐和舞蹈。盛唐呈现出音乐的高潮，从“动荡山岳”的跌宕到浅斟低唱的轻盈，奏出的是欢忙的世俗之音，而不是礼仪性的典重之调。当时舞蹈的特征是来自少数民族的急剧跳动的胡旋舞。“纵横跳动”，“旋转如风”。盛唐时期的诗歌、音乐、书法、舞蹈表现出如此相似的风格，正因为它们是当时社会氛围和文化心理的写照，“反映了世俗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上升阶段的时代精神”。把盛唐文艺同盛唐中唐之交的文艺两相对照，可以发现明显不同的审美风尚和艺术趣味，后者的典范是杜甫的诗歌、颜真卿的书法和韩愈的散文。李泽厚同志指出，杜诗颜字韩文的共同特征是“把盛唐那种雄豪壮伟的气势情绪纳入规范，即严格地收敛、凝炼在一定形式、规格、律令中”。

文化的文艺层次的明显特征是它的各种要素之间的组织性和系统联系，即它是某种整体。无论体现了盛唐之音的诗歌、书法、音乐、舞蹈，还是杜诗颜字韩文，它们风格的一致性正是文艺层次完整性外部表现。

李泽厚同志不仅在横的水平上对各种艺术样式作比较研究，而且在纵的过程中研究各种艺术样式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规律。他认为唐诗宋词元曲是三种不同类型的美。诗境深厚宽大，词境精工细巧，曲境酣畅明达；诗多“无我之境”，词多“有我之境”，曲则大都是非常突出的“有我之境”。诗词曲的三种境界近似于魏、唐、宋雕塑的三种类型。北魏雕塑以理想胜，人物形象是秀骨清相，长脸细颈，飘逸自得，深不可测。唐前期雕塑的特点是现实和理想的结合，人物形象充满人情味和亲切感，更为世俗化，丰满圆润代替了削瘦超脱，入世精神代替了神秘的微笑。宋朝雕塑以现实胜，它比唐代更为写实、逼真、亲切可爱，它完全是世俗的神，即人的形象。确实，把握文艺中的这种深层逻辑，对理解和欣赏它们具有重要的意义。

文化学方法对美学和文艺研究提出很多新的、重要的课题。例如，（一）研究某一种文艺样式时，应当经常顾及其他各种文艺样式，顾及文艺的统一。只有明确地认识整个文艺系统的审美特征，才能科学地建立某一种文艺样式的科学。不仅要研究和撰写单独的文艺样式的发展史，如文学史、音乐史、绘画史等，而且要研究和撰写综合的文艺史，如唐朝文艺史、明清文艺史，并且在文艺断代史的基础上写出文艺通史。（二）各种艺术门类在文艺史上得到不平衡的发展。在中国文艺史上，汉朝的工艺和赋、六朝的雕塑和骈体、唐朝的书法和诗歌、宋元的绘画和词曲、明清的戏剧和小说，分别是一代艺术的集中点。在外国文艺史上，古希腊的戏剧和雕塑、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和文学、十九世纪初期浪漫主义文艺中的音乐和诗歌起着类似的作用。如果孤立地研究文学史或绘画史，就不会提出这样的问题。综合地研究文艺史，不仅要提出这些问题，

而且要探索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三）把文化分成物质层次、精神层次和文艺层次，文艺层次处在物质层次和精神层次之间，而在文艺层次本身中，物质因素和精神因素的比重又在广阔的范围内发生变化。以这些原则为基础，可以更科学地解释一些文艺现象，探索文艺发展的因果联系。例如，盛唐之音的诗歌、书法是精神溢出物质，杜诗颜字韩文是精神与物质相吻合。在经济稳定繁荣的年代，物质因素所占比重大的艺术部类如建筑、工艺，就要昌盛发达一些；在社会动乱的年代，精神因素所占比重大的艺术部类如诗歌、绘画，也可相对繁荣。（四）把文艺置放在文化这个大系统中加以研究。要研究文艺同其他所有文化现象——政治、道德、宗教、哲学、科学等的联系。并且，不是把这些联系当作间接的研究对象，而是当作直接的研究对象；不是研究某种联系（例如文艺同宗教，或者文艺同哲学的联系），而是研究所有这些联系。

三

系统方法在文艺的综合研究中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文艺活动的研究史表明，不同科学都力图解决这项任务。文艺活动首先是文学（文学理论、音乐理论、戏剧理论、绘画理论、舞蹈理论等）的研究对象，这是一组专门研究各种文艺的学科。同时，从远古时代起，文艺就处于哲学的视野之内，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这样的哲学家都详尽地探讨过文艺。1735年鲍姆嘉敦在用拉丁语写成的学位论文《关于诗歌的某些问题的哲学思考》中第一次给“美学”命名后，美学就作为一个专门的学科从哲学中独立出来。尽管美学史上对美学的对象有很多不同的说法，但是谁也不否认，美学必然

要研究文艺。在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随着心理学、社会学、符号学这些知识领域的发展，它们对文艺表现出越来越浓厚的兴趣。这些知识领域和文学交融结合，又产生出一系列从不同角度研究文艺的学科——文艺心理学、文艺社会学、文艺符号学等。另外，还有人尝试运用数学、信息论、控制论来研究文艺（法国美学家M.邦斯就把文艺看作为实用信息论）。结果，研究文艺的科学越来越多，分工越来越细，研究方法也日趋缜密，在研究中取得了不少令人瞩目的成果。既然文艺活动是复杂的、多层次的系统，那么，必然要求一系列科学从不同角度进行研究。然而，对这些科学的产生、发展和现状作一番深入的思考后，就不能不提出一个重要的方法论问题：我们面临的是不同的、不协调的科学方法的偶然堆积和机械拼凑呢，抑或象所有的系统一样，它们是具有一定的内部结构、各成分之间合乎规律地发生联系的诸科学的系统呢？

这个问题不仅是根据系统方法从理论上推导出来的，而且是在文艺活动的研究史中屡次出现的。费希纳就把他所倡导的“自下而上的美学”——心理学美学，同他所卑称为“自上而下的美学”——哲学美学相对立。象费希纳这样片面抬高某一种科学方法的认识极限，而贬损其他科学的认识极限的做法，在美学研究中经常可以碰到。例如，在国外美学界，有人把美学看作为实用心理学，有人看作为实用认识论，有人看作为实用社会学，有人看作为实用符号学，有人看作为实用控制论，有人则看作为实用数学。而根据系统方法，文艺活动是有规律地组织起来和发展的整体，那么，它就不仅是多对象的客体，而且是系统对象的客体。换言之，文艺活动的各个组成部分（要素）虽然由不同的科学加以认识，但是，这些组成部分（要素）形成一个有机的、统一的系统，因此，研究它们

的一组科学就成为诸科学的系统。在这种系统中，每一门科学同其他科学的相互关系得到明确的规定，占有受到规律严格制约的一席之地，而不是任意地厝身其间的。

把研究艺术的各种科学作为一个完整的系统提出来，是一项复杂的工作。我们仅以美学和文艺社会学为例加以说明。国内外不少学者都否认文艺社会学具有独立存在的权利，用美学吞并或者代替它。例如，李泽厚同志认为文艺社会学是美学的三个组成部分之一〔5〕。莫斯科大学哲学系美学教研室主任、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美学室主任M·粵夫相尼科夫主张：“任务不在于创立某种新的、独立于美学的文艺社会学，而在于创造性地研究我们美学科学本身的社会学方面。”〔6〕苏联学者I-O·苏罗采夫说得更为直截了当：“依我看，文艺社会学作为特殊的科学学科，或者甚至作为文艺学知识的特殊部分，是不存在的，而且是不可能存在的。”〔7〕我们不同意这些看法。我们认为，各种科学对文艺活动的研究可以在两种认识论水准上进行：对于文艺活动来说非特殊的认识论水准和特殊的认识论水准。在第一种情况下，某种科学搜集文艺材料作为说明某些一般规律的例证，这些规律不仅仅表现在文艺中，它们是一般心理学规律或者一般社会学规律等。在第二种情况下，科学力图揭示这些一般规律在文艺活动中的特殊折射。这时候就产生出新的科学学科，在这些学科中，美学一方面同文艺学相融合，另一方面同心理学或者社会学相融合，它们被称作为“文艺心理学”、“文艺社会学”等。虽然这些科学的范围是历史地、逐渐地扩大的，但是它们无疑以所研究的系统的某些主要方面为界限，每种主要方面使得研究它的专门知识领域有必要存在。也就是说，美学、文艺社会学等各种研究文艺的科学，其内部构造取决于所研究对象的结

构。

美学和文艺社会学都是研究文艺活动的科学。如果说美学的基本问题是文艺对现实的关系，那么，文艺社会学的基本问题就是文艺对社会的关系。美学所关注的问题是文艺的样式、种类、体裁、方法、风格、流派，文艺的起源和功用，它的形象结构等。不难看出，这些问题就是文艺对现实的关系的各种方式。自亚里士多德时代起，人们就根据艺术反映的材料、方式和对象来确定文艺活动的样式、种类和体裁。对文艺的美学研究要回答这样的问题：文艺活动的对象组织的方式怎样？文艺如何从自己的现实对象方面被组织起来？而文艺社会学提出的问题则不同。它要问：这些样式、种类和体裁的文艺在读者、观众、听众那里取得成功的原因何在？换言之，它所过问的是文艺活动的社会组织的形式。不过，上述两种情况所研究的是同一种文艺活动，只是从不同的方面和角度来看待它：第一种情况是从文艺活动对自己的客体、对现实的关系方面来看待它；第二种情况是从文艺活动对自己的主体、对社会和人的关系方面来看待它。这样，美学和文艺社会学都把文艺活动当作自己的对象，它们是相互依赖、相辅相成的两个对立面。它们在研究文艺活动的诸科学的系统中互不重复，但又互相补充，而不是互相排斥，或者漠不关心地“和平共处”。

因此，要对文艺活动作富有成效的综合研究，并不取决于科学方法（文艺学方法、社会学方法、心理学方法等）的多样性，而取决于这些方法的协调一致和相互关联。为了从理论上论证这种协调一致和相互关联，必须揭示这些科学方法所共同认识的客体——文艺活动的结构。只有完整地考察文艺活动的结构，并把这种整体分割成若干要素（每种要素对于相应的科学是认识的对象），才能对

研究文艺活动的诸科学的系统作出完整而充分的理解。在这里，系统方法正为我们所必须。

注：

[1] 见B·C·秋赫金《反映，系统，控制论》，莫斯科，1972年，第11页。

[2] 见K·阿诺欣《功能系统理论》，载《生理学科学成就》第1卷，1970年第1期。

[3] 见A·拉波波尔特《对待一般系统论的各种方法》，载论文集《系统研究》，莫斯科，1969年，第64—95页。

[4] 见M·鸟格利诺维奇《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功能主义》，载《莫斯科大学通报》1972年第3期。

[5] 见《美学的对象与范围》，《美学》第3期，1982年。

[6] 《1972年布加勒斯特国际美学会议材料》，第1册，第11页，布加勒斯特，1972年。

[7] 《论艺术的社会学研究问题》，《哲学问题》1975年第3期第95页。

(选自《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1983年第3期)

运用系统原理进行审美研究试探

曾 永 成

本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普通系统论在西方和苏联先后传播开来并得到迅速发展。这一理论加深了对辩证法关于事物普遍联系的规律性的认识，也启发人们重视并深入发掘马克思理论和方法中的系统性原则。现代科学技术革命和社会实践已充分证实了这一理论的正确性和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借鉴现代科学发展的经验，我们也应该充分重视把系统论的基本原理运用到审美研究中，以探索审美研究的新课题和新角度。

根据系统原理，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意识的一切现象，无不处在一定的系统之中，又无不自成一个系统。在每一个系统内，整体与部分、部分与部分以一定的结构方式组织成相互密切联系的整体。系统原理强调事物的整体性，认为事物的质并不是各个部分的简单相加，而是组成该事物整体的各个部分（或因素）在一定结构和程序中相互作用和制约的结果。这就是所谓事物的系统质（又称为“非加和性的”或“集成化的”质）。事物的这种质的揭示，说明了事物的那些不能仅仅归结于自身而与所处整体不可分离的某些属性的根源。系统质并不一定都物化在组成该系统的事物身上，而往往是存在于同其他事物的联系之中。对事物联系的系统性和事物的系统质的揭示，克服了对事物先分析为各部分而后加以综合这种传统方法的局限，也避免了简单因果论和线性因果论的缺陷，开拓了从整体出发，从整体与部分的有机联系中考察事物的新方法。这就

使我们能在事物的网状立体的系统联系中更充分地认识具有有机的和复杂的联系的事物。

人类的审美活动也是一个特殊的系统性领域。对于这一领域中的规律，自然也必须遵循系统原理所指示的方法去加以全面的研究，才可能尽量地揭开这一领域的全部复杂性。否则，人们在对审美活动进行考察时就难免把研究的对象从所处的复杂的系统性联系中孤立出来，而且有时把它本身也只看作一个混沌的实体。在我们的美学研究中，曾由于在考察对象时注意了事物的系统性联系，因而在某些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同时，又由于对系统原理的掌握和运用还并不自觉和充分，才造成了“各执一隅之见”而“欲拟万端之变”的困境。这就需要我们从方法论上认真总结审美研究的经验教训，以便借助于方法论的改善使审美研究有实质性的突破。把系统原理全面地运用来指导审美研究，它所展示的美妙前景是令人神往的。这里，仅谈谈自己在思索这一方法论问题时的粗浅感想。

(1) 在“自然向人生成”的系统运动中考察美的本质

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了康德关于“自然向人生成”的自然客观目的论观点，指出：“社会是人与自然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体。”“全部所谓世界史乃不过是人通过劳动生成的历史，不过是自然向人生成的历史。”又说：“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一个现实的部分，是自然界生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这就把自然和人、自然和社会统一在一个宏大浩瀚，囊括一切事物，而以人的实践为核心、以人与自然和人与人的矛盾为基本矛盾的系统之中，并揭示了这一系统的客观运动进程。“自然向人生成”，就是对这一系统的系统质的最简洁的概括。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及其整个学说就是以这个系统为对象。